

DOI:10.16781/j.0258-879x.2021.05.0563

• 短篇论著 •

军人评价恐惧在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中的中介作用

黄晨玮¹, 康育玮¹, 张博睿¹, 冯琪云¹, 刘子豪¹, 张帆^{2*}

1.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学员三大队, 上海 200433

2.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基础心理学教研室, 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考察军人负性认知偏向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及评价恐惧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法选取海军某部 878 名官兵, 采用正性评价恐惧量表(FPES)、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表(BFNES)、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和社交焦虑量表(IAS)分别对军人的正性评价恐惧、负性评价恐惧、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水平进行测量,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评价恐惧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 4 个维度(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负性沉思偏向)得分及总得分与 FPES、BFNES、IAS 得分之间均呈正相关(P 均 <0.01)。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 评价恐惧起部分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为 0.31, 95% CI 0.26~0.35, 且正、负性评价恐惧的作用相互独立。**结论** 军人评价恐惧在负性认知偏向与社交焦虑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应引导军人正确看待他人的评价。

[关键词] 军事人员; 认知偏向; 评价恐惧; 社交焦虑

[中图分类号] R 8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8-879X(2021)05-0563-05

Mediating role of soldiers' fear of evaluation in negative cognitive bias and social anxiety

HUANG Chen-wei¹, KANG Yu-wei¹, ZHANG Bo-rui¹, FENG Qi-yun¹, LIU Zi-hao¹, ZHANG Fan^{2*}

1. The Third Student Team,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Department of Basic Psychology, Faculty of Psychology,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cognitive bias and social anxiety in serviceman, and to underst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evalu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878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 naval force. 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FP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FNE), negative cognitive bias and social anxiety levels were measured by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questionnaire and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4 dimensions (negative attention bias, negative memory bias,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negative rumination bias) and total scores of negative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questionnaire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cores of FPES, BFNES and IAS (all $P<0.01$).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fear of evaluation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0.3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26-0.35, and FPE and FNE were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Conclusion** Soldiers' fear of evalu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bias and social anxiety, and soldiers should correctly treat others' comments.

[Key words] military personnel; cognitive bias; fear of evaluation; social anxiety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21, 42(5): 563-567]

军营环境人员密集, 涉及多方面的人际交往, 如战友之间的交往、士兵与士官的交往、战士与干

部的交往等, 社交是军人正常工作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社交焦虑成为困扰部队广大官兵的人

[收稿日期] 2020-07-28

[接受日期] 2020-09-27

[基金项目] 海军重点课程建设项目(20180925),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2018B-N06024)。Supported by Naval Key Course Construction Project (20180925) and Medical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 of Medic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Chinese Society of Higher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Branch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2018B-N06024)。

[作者简介] 黄晨玮. E-mail: nmuhcw@163.com

*通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 Tel: 021-81871671, E-mail: zhangfansmmu@163.com

际关系问题,此现象在特殊兵种、特定驻地的官兵群体中尤为突出,并由此诱发很多心理问题^[1-3]。

社交焦虑的认知理论强调负性认知偏向在社交焦虑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大量研究证明,社交焦虑个体存在负性认知偏向。如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非社交焦虑个体间存在认知加工差异,导致对刺激产生不同的认知偏向,从而使社交焦虑个体忽视正性积极信息而强调负性消极信息^[4-5]。这种忽视具体分为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和负性沉思偏向等多方面,最终汇集为社交焦虑个体的负性认知偏向^[6]。其中,注意偏向使社交焦虑人群更加关注人际交往中的消极信息;记忆偏向会加强社交焦虑人群的负性记忆,并降低他们对正性回忆的效价评分^[7-8];解释偏向使社交焦虑人群从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更多的消极情感体验,而对积极事件打折扣^[9];最后,发生在交往事件前、后的负性沉思偏向使社交焦虑人群陷入负性自我评价及对未来的担忧,使焦虑情绪得以维持^[10]。由此可见认知偏向影响社交焦虑人群对外界信息的加工,可能使他们对负性评价更加关注,并对正性评价产生歪曲的解释。

我们假设负性认知偏向可能与评价恐惧有关。评价恐惧包括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两者通常被认为是社交焦虑的核心特征^[11]。正性评价恐惧指他人对自己的积极正向评价所引发的担忧与恐惧^[11],而负性评价恐惧指由于他人对自身的消极负向评价所产生的担忧与恐惧^[12]。多项研究证实社交焦虑个体存在负性评价恐惧的特点^[13-15];而正性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具体影响目前主要存在2种机制,第1种是对满足他人期望的担忧,第2种是对引发人际冲突的担忧。第1种观点认为,个体成功的社交表现促使他人期待他在之后的社交过程中继续成功,对他表现出更高的期望。正是由于无法保证自身在将来的社交中表现出众、难以回应他人的高期望,个体对正性评价产生恐惧和担忧,并继发焦虑体验^[16-17]。第2种观点认为社交焦虑个体担心由于获得他人关注与赞赏而引起与他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反而无法维护自身利益,故表现出低调处事的行为^[18]。杨鹏等^[19]通过对高社交焦虑大学生的访谈发现,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正性评价的解释路径可归纳为“正性评价提升他人期望”和“正性评价增加人际冲突”,高社交焦虑组对正性评价的消极解释评分高于低社交焦虑组、对正性评价的积极解释评分低于低社交焦虑组,表明对他人评价的消极认知引发了评价恐惧情绪。

我们认为认知偏向、评价恐惧及社交焦虑之间存在关联,并且负性的认知偏向可能导致了评价恐惧情绪,进而引起社交焦虑。本研究选取军人为研究对象,测量他们的负性认知偏向、正性和负性评价恐惧水平及社交焦虑的程度,假设评价恐惧是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中介因素。既往研究发现,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相互独立,但均能引发社交焦虑个体产生焦虑体验^[20],故我们假设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均起到中介作用。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10月20日至11月5日,对海军某部官兵进行随机抽样,在线调查官兵的负性认知偏向、评价恐惧水平及社交焦虑情况。共在线发放问卷900份,删除作答时间不足5min的问卷22份,得到有效问卷878份,有效率为97.6%。878名官兵均为男性,年龄为17~35岁,平均(24.20±4.83)岁。

1.2 研究方法

1.2.1 正性评价恐惧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S) 该量表由Weeks等^[20]于2008年编写,2012年由吴素红^[21]编译并引入国内,共包含10道题目,采用10级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正性评价的恐惧水平越高。为了检测被试潜在的认同性作答反应倾向,所设置的2道反向计分题(第5、10题)不计入总分。本研究中,为了与其他量表统一,每题采用5级计分,即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完全符合)。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

1.2.2 简明负性评价恐惧量表(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BFNES) 该量表由Leary^[22]于1983年编制,中文版由陈祉妍^[12]编译,共包含12道题目,采用5级计分法,即从1分(完全不符合)到5分(完全符合),其中有8道题为正向计分(第1、3、5、6、8、9、11、12题)、4道题为反向计分(第2、4、7、10题),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负性评价越恐惧。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79。

1.2.3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 该问卷由闫晓钊等^[23]编制,包含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负性解释偏向、负性沉思偏向4个维度,共25道题目。根据被试按条目陈述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4级计分,总分为25~100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于负性信息的消极加工偏好越强。全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3(分半信度系数为0.866),注意偏向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1,记忆偏向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解释偏向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 沉思偏向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3, 总体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1.2.4 社交焦虑量表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 该量表由 Leary 和 Kowalski^[24] 于 1993 年编制, 由叶冬梅等^[25] 编译并引入国内, 共包含 15 个条目, 根据条目陈述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 5 级计分, 总分为 15~75 分,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测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用 Amos 23.0 软件完成。计量资料以 $\bar{x} \pm s$ 表示, 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Pearson 法进行相关分析, 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模型的间接效应检验。检验水准 (α) 为 0.05。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所有项目载荷在同一个公因子上, 结果模型拟合指标如下: $\chi^2=10\ 957.25$, $\chi^2/df=7.66$, 比较拟合指数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63, Tucker-Lewis 系数 (Tucker-Lewis index, TLI) = 0.62, 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 0.086, 表明单一维度模型不成立, 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评价恐惧、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水平及相关性 结果如表 1 所示, 正、负性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和负性认知偏向的各维度之间均相关, 其中社交焦虑量表得分与正、负性评价恐惧得分呈正相关 (P 均 < 0.01), 说明军人社交焦虑水平可能受正、负性评价恐惧的影响。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正、负性评价恐惧得分均呈正相关 (P 均 < 0.01), 同时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也社交焦虑量表得分结果均呈正相关 (P 均 < 0.01)。结果提示正、负性评价恐惧可能是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中介因素。

表 1 评价恐惧、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水平及相关性

变量	得分, $n=878, \bar{x} \pm s$	相关分析 r							社交焦虑
		正性评价 恐惧	负性评价 恐惧	负性认知 偏向	负性注意 偏向	负性记忆 偏向	负性解释 偏向	负性沉思 偏向	
正性评价恐惧	6.77 ± 4.91	1							
负性评价恐惧	8.24 ± 5.67	0.347**	1						
负性认知偏向	6.32 ± 3.58	0.306**	0.218**	1					
负性注意偏向	6.83 ± 2.12	0.456**	0.386**	0.407**	1				
负性记忆偏向	34.82 ± 2.86	0.496**	0.454**	0.396**	0.670**	1			
负性解释偏向	12.78 ± 1.86	0.488**	0.438**	0.406**	0.683**	0.656**	1		
负性沉思偏向	26.44 ± 2.34	0.482**	0.346**	0.366**	0.646**	0.681**	0.629**	1	
社交焦虑	20.62 ± 7.41	0.591**	0.496**	0.315**	0.531**	0.486**	0.522**	0.481**	1

** $P < 0.01$.

2.3 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以负性认知偏向为自变量、负性评价恐惧和正性评价恐惧为中介因

素、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模型拟合, $\chi^2=55.91$, $\chi^2/df=4.66$, CFI=0.99, LI=0.98, RMSEA=0.065, 各项拟合指标良好, 证明模型成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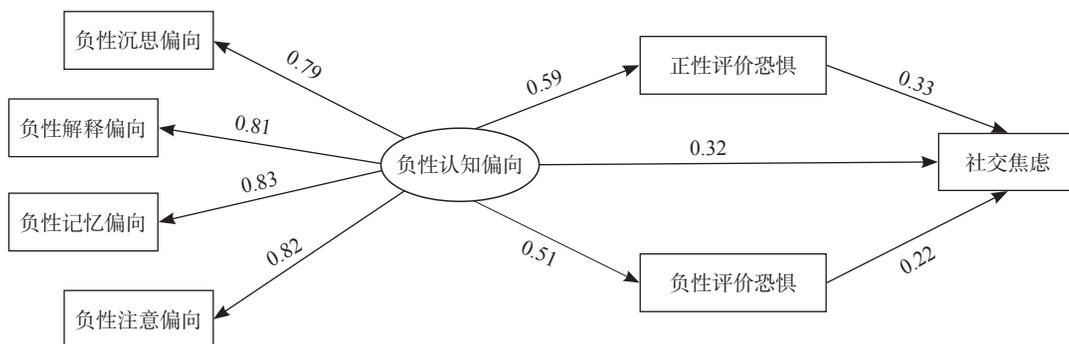


图 1 正、负性评价恐惧在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会焦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箭头上的数据为路径系数。

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利用随机重复抽样方法在原始数据 ($n=878$) 中抽取 5 000 个 Bootstrap 样本生成一个近似抽样分布,用第 2.5 百分位数和第 97.5 百分位数估计中介效应的 95% CI。结果评价恐惧的间接效应为 0.31, 95% CI 0.26~0.35, 该区间不包含 0, 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负性认知偏向对社交焦虑的直接影响大小为 0.32, 95% CI 0.25~0.38, 说明除了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外, 负性认知偏向还对社交焦虑有直接影响。负性认知偏向对社交焦虑的总影响值达到 0.63, 其中通过评价恐惧的间接影响和直接影响各占总体影响的 49.2% (0.31/0.63) 和 50.8% (0.32/0.63)。

以上结果说明, 正、负性评价恐惧总体上在负性认知偏向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为了说明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各自的中介效应, 我们将负性认知偏向 4 个维度的总分求和, 得到负性认知偏向总分, 并以该总分为自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以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为中介因素, 通过 SPSS 软件的 Process 模块进行中介效应分析^[26]。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得到总间接效应和 2 个中介因素各自的间接效应量。总间接效应量为 0.29 [标准误 (standard error, SE) = 0.03], 95% CI 0.24~0.35; 以正性评价恐惧为中介因素的间接效应量为 0.19 (SE = 0.03), 95% CI 0.13~0.24; 以负性评价恐惧为中介因素的间接效应量为 0.11 (SE = 0.02), 95% CI 0.07~0.14, 正性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量大于负性评价恐惧。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军人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 这与潘朝霞等^[15]对中学生样本的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在军人群体中评价恐惧也是社交焦虑的危险因素; 不论是正性评价恐惧还是负性评价恐惧, 均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 说明社交焦虑个体不仅惧怕负面评价, 对他人的积极评价也感到害怕。我们假设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是负性认知偏向导致社交焦虑者过分关注负性信息并歪曲了正性信息。通过将负性认知偏向引入相关矩阵我们发现, 负性认知偏向的 4 个维度及总水平与评价恐惧和社会焦虑之间均相关, 说明认知因素可能与恐惧和焦虑的产生相关。

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我们发现, 正、负性评价恐惧能够介导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关系,

且在模型中两者的作用相互独立。通过单独分析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量, 我们还发现正性评价恐惧的中介效应量较负性评价恐惧更大。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Weeks 和 Howell^[27]提出的双重评价恐惧模型, 该模型认为负性评价恐惧和正性评价恐惧相互独立, 并且负性评价恐惧在社交焦虑的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有研究发现, 相比负性评价恐惧, 正性评价恐惧指标更能反映社交焦虑人群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28]。

Dryman 和 Heimberg^[29]测量了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评价恐惧, 并利用词句联想任务^[30]测量了被试在线和离线的解释偏向水平, 其中在线解释偏向通过反应时表示, 离线解释偏向通过负性解释的选择率表示。结果发现, 只有正性评价恐惧能够介导社交焦虑和在线解释偏向的关系; 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均不能介导离线解释偏向得分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该结果与本研究有一些不同, 原因可能是我们对负性认知偏向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测量。在负性认知偏向中, 负性注意偏向、负性记忆偏向等认知偏向类型与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密切相关^[21,31], 可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加入, 我们证实评价恐惧在负性认知偏向和社交焦虑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不仅存在评价恐惧的部分中介作用, 负性认知偏向对社交焦虑还存在着直接影响^[32-33]。

本研究结果表明, 负性认知偏向、正性评价恐惧和负性评价恐惧均在军人社交焦虑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可以通过干预这些因素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表现。基于计算机的认知偏向矫正训练^[34]或者态度干预训练^[35]能有效改善个体对他人评价的态度, 减少人际焦虑。除了进行心理干预, 部队心理骨干在日常生活中应关注官兵表现出的社交焦虑行为, 如回避人多的场合、过分关注他人评价等, 引导那些有异常行为的官兵正确看待他人评价, 不必过分关注和担忧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表现, 鼓励他们参与更多的社交活动, 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在公共场合发言, 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总之, 通过干预负性认知偏向和评价恐惧促进军人正常人际交往, 提高军营人际和谐氛围, 在基层心理健康促进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 [1] 彭洁颖, 陈华. 某部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及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调查[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17, 38: 1327-1329.

- PENG J Y, CHEN H.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anxiety statu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personality of soldiers stationed on island[J].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17, 38: 1327-1329.
- [2] 赵梦雪,冯正直,王毅超,赖薇,胡丰,刘可愚,等. 1993~2013年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状态的横断历史研究[J]. *心理学报*, 2017, 49: 653-662.
- [3] 尼春萍,徐莎莎,画妍,王全祥,王晶,邵佩,等. 驻守特殊环境官兵述情障碍与焦虑的相关性分析[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17, 35: 479-480, 484.
- [4] HEINRICHS N, HOFMANN S 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social phobia: a critical review[J]. *Clin Psychol Rev*, 2001, 21: 751-770.
- [5] CHEN N T, CLARKE P J, MACLEOD C, GUASTELLA A J. Biased attentional processing of positive stimuli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n eye movement study[J]. *Cogn Behav Ther*, 2012, 41: 96-107.
- [6] TAYLOR C T, BOMYEA J, AMIR N. Attentional bias away from positive social information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anxiety vulnerability to a social stressor[J]. *J Anxiety Disord*, 2010, 24: 403-408.
- [7] AMADA G. Social phobia: diagno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J]. *Am J Psychother*, 1996, 50: 373-374.
- [8] GLAZIER B L, ALDEN L E. Social anxiety and biased recall of positive information: it's not the content, it's the valence[J]. *Behav Ther*, 2017, 48: 533-543.
- [9] 李涛,冯菲.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 研究范式、特征及矫正[J].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 2196-2203.
- [10] MODINI M, ABBOTT M J.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anxiety and rumination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J]. *Behav Change*, 2016, 33: 150-171.
- [11] WEEKS J W, HEIMBERG R G, RODEBAUGH T L, NORTON P J.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anxiety[J]. *J Anxiety Disord*, 2008, 22: 386-400.
- [12] 陈祉妍. 中学生负面评价恐惧与考试焦虑的相关性[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2, 16: 855-857.
- [13] 彭顺,汪夏,牛更枫,张红坡,胡祥恩. 负面评价恐惧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基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9, 35: 121-128.
- [14] 贾彦茹,张守臣,金童林,张璐,赵思琦,李琦. 大学生社会排斥对社交焦虑的影响: 负面评价恐惧与人际信任的作用[J]. *心理科学*, 2019, 42: 653-659.
- [15] 潘朝霞,张大均,潘彦谷,胡天强. 中学生自尊和评价恐惧在心理素质与社交焦虑中的中介作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8, 32: 676-681.
- [16] WALLACE S T, ALDEN L E. Social anxiety and standard setting following social success or failure[J]. *Cogn Ther Res*, 1995, 19: 613-631.
- [17] WALLACE S T, ALDEN L E. Social phobia and positive social events: the price of success[J]. *J Abnorm Psychol*, 1997, 106: 416-424.
- [18] GILBERT P. Evolu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attraction, social competition, and social hierarchies[J]. *Psychiatr Clin North Am*, 2001, 24: 723-751.
- [19] 杨鹏,蒋婧琪,李松蔚,姚泥沙,余红玉,王小玲,等. 社交焦虑大学生对正性评价解释偏向的初步探究[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 933-938.
- [20] WEEKS J W, HEIMBERG R G, RODEBAUGH T L. 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assessing a proposed cognitive component of social anxiety[J]. *J Anxiety Disord*, 2008, 22: 44-55.
- [21] 吴素红. 评价恐惧个体的认知加工偏向研究[D]. 宁波: 宁波大学, 2012.
- [22] LEARY M. A brief version of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J]. *Pers Soc Psychol Bull*, 1983, 9: 371-375.
- [23] 闫晓帆,张睿,冯正直. 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的研制[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7, 39: 2329-2334.
- [24] LEARY M R, KOWALSKI R M. The 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construct and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J]. *J Pers Assess*, 1993, 61: 136-146.
- [25] 叶冬梅,钱铭怡,刘兴华,陈曦. 社会交往焦虑量表和社交恐惧量表的修订[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 115-117.
- [26] HAYES A.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J]. *J Edu Meas*, 2013, 51: 335-337.
- [27] WEEKS J W, HOWELL A N. The bivalent fear of evaluation model of social anxiety: further integrating findings on fear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aluation[J]. *Cogn Behav Ther*, 2012, 41: 83-95.
- [28] REICHENBERGER J, WIGGERT N, WILHELM F H, WEEKS J W, BLECHERT J. "Don't put me down but don't be too nice to me either": fear of positive vs.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responses to positive vs. negative social-evaluative films[J]. *J Behav Ther Exp Psychiatry*, 2015, 46: 164-169.
- [29] DRYMAN M T, HEIMBERG R G.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anxiety, fears of evalu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ias[J]. *Cogn Ther Res*, 2015, 39: 646-657.
- [30] BEARD C, AMIR N. Interpretation in social anxiety: when meaning precedes ambiguity[J]. *Cognit Ther Res*, 2009, 33: 406-415.
- [31] SLUIS R A, BOSCHEN M J. Fear of evaluation in social anxiety: mediation of attentional bias to human faces[J]. *J Behav Ther Exp Psychiatry*, 2014, 45: 475-483.
- [32] 汪涛,徐晓晓,王慧龙,胡丰,靳灿灿,韩彬伟,等. 青年男性军人特质焦虑与积极消极情绪的关系: 沉思的中介效应与文化程度的调节作用[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20, 42: 119-124.
- [33] 张晓敏,蔡文鹏,陈艾彬,屠志浩,刘广宇,邓光辉. 高、低状态焦虑军人解释偏向的差异研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9, 22: 2856-2860.
- [34] NAIM R, KIVITY Y, BAR-HAIM Y, HUPPERT J D.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bias modification treatment for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of efficacy and synergy[J]. *J Behav Ther Exp Psychiatry*, 2018, 59: 19-30.
- [35] 张红. 高社交焦虑大学生对负性评价恐惧的内隐态度及其干预研究[D]. 深圳: 深圳大学, 2018.